

#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变迁研究

## ——基于2001—2019年的文本计量分析

林媛媛, 车璐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文章以2001—2019年国务院和国家商务部颁布的共319项外贸政策为样本, 首先从政策数量和政策工具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将外贸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鼓励型和保护型; 其次采用自编软件根据主题词词频变化进行文本计量分析, 得出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不同阶段外贸政策的不同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 2001—2019年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规律表现为外贸政策聚焦点实现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转变、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向实现贸易平衡转变; 对外贸易政策变迁的过程是对外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发展的过程; 对外贸易政策保障措施越来越完善。

**[关键词]** 对外贸易政策; 政策变迁; 文本计量; 词频分析

**[中图分类号]** F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2021)01-0050-09

###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G20大阪峰会上提到,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 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近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加重, 其引起的全球贸易摩擦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巨大的贸易政策壁垒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sup>[1]</sup>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纵观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 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 全方位改革开放, 无论是在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上国内外都有目共睹。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sup>[2]</sup>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表明, 2001年我国货物贸易仅占全球份额的4.0%, 列第6位, 而在2013年时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从

2001年的第6位一跃成为如今的贸易大国, 并向贸易强国的目标迈进。贸易强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强、对外贸易质量效益好、在国际市场拥有重要产品定价、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sup>[3]</sup>而在服务贸易方面, 2014年起中国已经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二, 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也需要进一步的突破和转型。迈入新时期,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减弱, 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和实施使得我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sup>[4]</sup>韩慧霞、金泽虎认为贸易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外贸产业升级带来抑制作用。<sup>[5]</sup>为了发展新一轮中国经济, 我国把实施进一步扩大进口, 扩大开放领域, 建设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等一系列新措施作为重点。肖维鸽也认为扩大进口可以通过平衡对外贸易来缓解贸易摩擦。<sup>[6]</sup>中国外贸在近年的快速赶超大大超前于经济的赶超, 累积了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外贸政策滞后等。<sup>[7]</sup>同时, 我国目前在国际上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角色和贸易大国地位还不匹配。<sup>[8-9]</sup>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的不足限制了我国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sup>[10]</sup>始终保持举足轻重

**[收稿日期]** 2020-04-10

**[作者简介]** 林媛媛(1964—), 女, 福建龙岩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外贸政策指导,合适的贸易政策可以提高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主动性,增加研发投入总额,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sup>[11]</sup>,实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并建立良好的外贸秩序。<sup>[12]</sup>周定根、杨晶晶、赖明勇研究得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sup>[13]</sup>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梳理“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以来外贸政策的演变过程,从实践发展中获得宝贵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是十分迫切且必要的。

作为政策分析的辅助工具,政策文本计量能够提供实证数据与客观描述,使得政策研究建立在翔实的事实基础上,产生一定程度的方法创新。黄萃、任弢、张剑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sup>[14]</sup>;李江、刘源浩、黄萃、苏竣分析了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sup>[15]</sup>;裴雷、孙建军和周兆韬利用这种方法识别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分析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sup>[16]</sup>目前国内运用文本计量方法进行国家外贸政策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对外贸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分析能够清晰地梳理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脉络,从外贸政策的变迁中总结规律,科学预测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为国家统筹规划后续对外贸易政策与评价提供思路,不断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对实现贸易强国目标有一定参考。

## 二、对外贸易政策变迁的研究方法、思路与资料来源

### (一) 研究方法与思路

外贸政策作为一种国家对外经贸合作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多数学者都是对政策进行定性分析,而量化分析难度较大,笔者采用自编软件对2001—2019年国务院和国家商务部针对对外贸易颁布的共319个外贸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从政策累计数量、政策工具类型、公文文种类型这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趋势,试图为未来外贸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视角。

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不断加深,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对外贸易迈上了新台阶。我国的对外

贸易政策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了深刻变革,外贸政策向更加适应经济和政治上的改变的方向过渡,成为连接国内外经济社会的纽带。盛斌、魏方梳理新中国70年间的对外贸易发展,发现我国的贸易政策逐渐演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sup>[17]</sup>在时间维度上,考虑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里程碑,我国外贸事业跨入新的征程,出台了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外贸政策,外贸环境有了很大提升,国际贸易交流逐渐频繁,贸易规模创造新高,开始向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过渡。因此由2001年作为起始时间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更具有时效性,更能够准确观察到近年来我国与时俱进的外贸政策变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原称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联系紧密,指导了对外贸易政策的战略目标以及具体实施的方向,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可持续的长远目标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制度优势之一。一方面,通过五年规划对外贸政策变迁的进程进行划分,能够从中把握不同时期的外贸政策阶段性的特征,探索外贸政策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我国外贸政策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处在不断调整和创新之中,五年规划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因此按照第十个五年计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总体上将2001年至2019年的对外贸易政策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大力出口期(2001—2005)、稳定增长期(2006—2010)、平衡发展期(2011—2015)和稳中提质期(2016—2019),时间跨度分别为5、5、5、4年,总年限为19年。

### (二) 资料来源:构建2001—2019年对外贸易政策文件库

在发文机构维度上,笔者发现,为更好应对不可避免的国际竞争,健全国内市场体系,2003年3月政府在融合原外经贸部和原国家经贸委职能的基础上组建了商务部,总体负责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制定及外贸活动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商务部在2001—2019年发布的共233项部令中,有

76项是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合发文,涉及海关总署、工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9个机构和部门,将“十五”到“十三五”四个阶段商务部发文合作的部门进行梳理和统计。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合发文有助于推动政策的有效制定和实施,保障政策的执行效果,联合各部门的力量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因此,构建2001—2019年对外贸易政策文件库时,除了选取国家商务部颁布的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233项部令,还选取了国务院官方网站公布的有关对外经贸合作的86项宏观战略性政策。选取的时间范围自2001年1月1日起,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得到政策总数为319项。

### 三、对外贸易政策文件库的定性分析

按以上方法构建的2001—2019年对外贸易政策文件库中319项政策文本,基于政策数量、政策工具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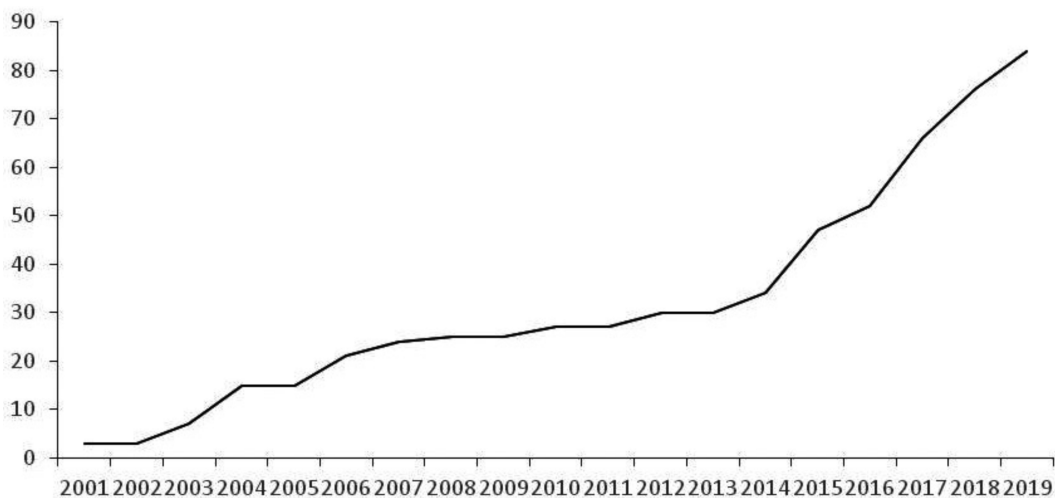


图1 国务院2001—2019年关于对外贸易政策累计数量变化图

#### (二) 对外贸易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工具理论认为政策其实是将一系列反映决策规律的基本工具进行选择 and 组合,以便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运用政策工具理论,从政策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手段中看待政府的管理行为,从而理解其政策意图。陈振明和张敏在关于国内政

#### (一) 对外贸易政策的数量及变化趋势

对国务院发布的对外贸易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数量统计,得到2001—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对外贸易政策的数量及变化趋势(见图1)。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政策数量有所增加,政策内容以履行入世承诺、扩大对外开放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5年期间,国务院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文件数量增加少,趋势较平缓,反映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冲击,政策上的调整还有待加强。在危机后期国内外经济水平陆续恢复,加上2013年9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发挥政策效应,因此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后,外贸相关的政策数量又出现了高速增长,反映了对外贸易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肯定和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从政策数量的累计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国务院对于对外贸易的关注度在19年里逐渐增加,特别是近5年内,国家对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力度不断加大,保证了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在政策方面的供给,体现了政府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建设贸易强国的意志。

策工具新进展的研究中指出,以满足社会实践需求为目的的政策工具优化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sup>[18]</sup>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政策工具,出台相应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得到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补充政策上的不足,从而更有效地达成具体经济目标。<sup>[19]</sup>2014年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29号）中按照直接影响进口、直接影响出口和其他政策措施列出了25项可能影响贸易的政策措施，并按照管制型工具、鼓励型工具和保护型工具这三大类型进行统计。由于国家商务部发布的政策文件相对而言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在商务部部令中剔除“修改”“废止”类文件及商务部内部行政管理类文件后，按照文件主要运用的政策工具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可以看出在加入WTO前期商务部的政策文件主要集中于进出口禁止、限制和许可方面，针对特定产业的外贸政策较多，如机电产业、纺织业、汽车产业等，稳定市场的保护

型政策工具也较多。随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逐渐迈向自由化、便利化，诸如竞争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的保护型政策工具逐渐减少。与贸易有关的行业管理和外商投资政策等鼓励型政策工具和市场准入类的管制型政策工具互相搭配。还可以看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仍然较为缺乏，与进出口有关的融资政策和政府补贴及支持也需要适度增加。在关税等传统管制型工具逐渐被限制的今天，只有熟练地选择和使用各种新型的政策工具，外贸政策才能被有效地实施和执行，从而达到其目的。

表 1 2001—2019 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策类型分布情况

政策类型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19
管制型工具	市场准入	0	2	0	4
	进出口禁止、限制和许可	22	9	3	0
	标准和其他技术要求	5	4	3	0
	招标投标管理	3	0	2	0
鼓励型工具	涉及贸易的行业规定	20	19	6	2
	与进出口有关的融资政策	0	2	0	0
	外商投资管理	21	8	4	4
	贸易救济	3	4	8	1
保护型工具	竞争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	28	11	6	4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政策	0	1	0	0
	补贴及其他政府支持	1	0	0	0

## 四、中国外贸政策变迁的文本计量分析

### （一）分析框架设计

国务院和商务部针对对外贸易公布的公文是国家在特定阶段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和思路体现，包括了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预判和今后一段时间外贸工作的方针布局。为了分析2001—2019年国家外贸政策变迁的规律，笔者采用自编软件统计不同阶段对外贸易政策文本中的词频，以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作为国家和部门未

来工作的聚焦点，经过词频分析得出4个时期我国外贸政策的不同特点，为总结我国外贸政策演变规律并提出建议提供分析依据。

### （二）外贸政策文本库的词频分析

1. 大力出口期（2001—2005）。“十五”计划期间，国务院共颁布了15项对外贸易政策，商务部共发布了112项对外贸易政策。笔者运用自编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去除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主题词“出口”“进口”“进出口”“企业”等及其相近词后的统计结果，按照主题词频数高低统计排序，得到高频主题词图（见图2）。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



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在刚加入WTO的这个时期,我国开始了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市场的过渡,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循序渐进地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全球化背景下,外贸形势多变且复杂,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以往相比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最重要的是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逐渐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外贸管理体制,同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出口,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2. 稳定增长期(2006—2010)。“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务院共颁布了12项对外贸易政策,商务部共颁布了63项对外贸易政策,笔者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去除一些无意义的词之后按照主题词频数高低统计排序(见图2)。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尽可能减小对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冲击,“十一五”规划时期的外贸政策主要将重点放在优化政策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支持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运用政策工具刺激外贸增长和维持国内经济稳定。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遭受了较大冲击,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受到一定冲击。我国出口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贸易摩擦,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外贸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调整外贸政策,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同时保持外贸增长稳定。外贸出口和进口规模都进一步扩大,开放型经济水平逐渐提高。

3. 平衡发展期(2011—2015)。立足于201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量、进口量分别占据世界总量的第一和第二的国情,2012年4月商务部印发《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稳定外贸持续增长,升级外贸发展结构,促进进出口平衡的重点,以实现贸易强国为目标,深度提升我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此期间,国务院共颁布了20项对外贸易政策,商务部共发布了33项对外贸易政策,笔者运用自编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按照主题词频数高低统计排序,得到高频主题词图(见图2)。该阶段的外贸政策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导向,更加强调外贸发展的科学性

和可持续性。这一时期我国外贸发展主动性增强,设立上海自贸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有效措施,政策惠及中西部的内陆城市。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全新时代,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政策对质量和效益的重视更加明显,强调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创新贸易方式等追求技术和质量的战略方向。

4. 稳中提质期(2016—2019)。经济发展新常态下,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在此期间,国务院共颁布了39项对外贸易政策,商务部共发布了25项对外贸易政策。笔者运用自编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得到高频主题词图(见图2)。近年来对外贸易的重心进一步转向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传统的开放战略朝双边、区域性的方向发展,国际市场贸易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2019年,我国贸易伙伴数量发展到230多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18个,沿海省份已全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积极推进,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5. 词频分析结论。总的来看,为了总结2001—2019年国家外贸政策变迁的规律,摘取各阶段词频数量最多的前20个关键词(见图2),其中用实线和虚线框出来的是在4个阶段重复出现的高频词汇。“投资”“外商投资”在4个阶段排名都靠前,这是由于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离不开投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商投资者的吸引力,营造自由便利的外贸环境,有利于增强投资的拉动力,形成开放型经济。在前2个阶段“申请”“发证”出现相对频繁,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外贸体制机制逐渐完善,“创新”“试验区”“服务”“监管”等关键词在后期数量增多。可以看出国家对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支持政策逐渐丰富,外贸结构逐步调整,服务贸易的地位上升,和货物贸易一样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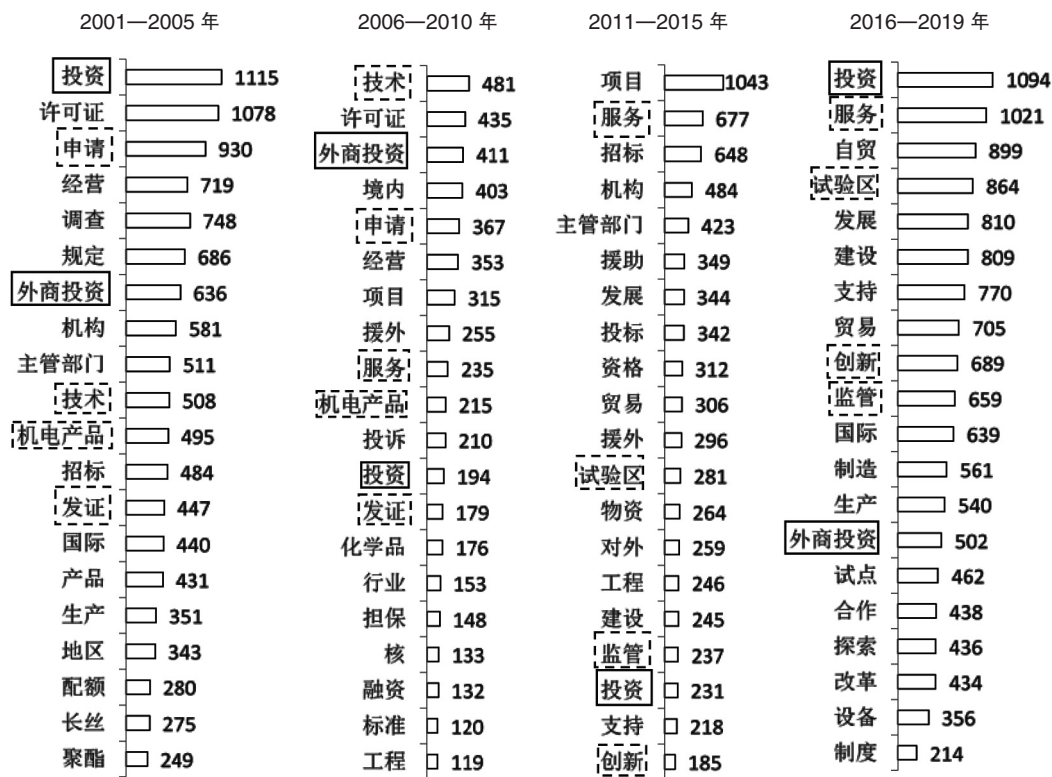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9 年对外贸易政策词频变化

（三）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

通过以上词频分析和文本分析，可以总结分析出不同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

1. 大力出口期（2001—2005）。（1）根据国际规则推进贸易自由化，取消进口配额、进口许可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壁垒；履行关于汽车与零部件、纺织品与服装、信息技术产品等的关税减让承诺；注重货物进出口管理规范问题，同时大力推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制度。（2）大力推动出口，利用我国比较优势，降低外贸产品成本，大力发展机电产品、汽车、钢铁等优势产业，为新成长的外贸企业提供财税支持，鼓励和扶持新兴外贸行业。同时引导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强其国际竞争力。（3）拉动外资企业成为贸易主体，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部分对外贸易。维护我国外贸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积极实施并不断在实践中继续调整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和保障措施，营造公平公正的外贸营商环境。

2. 稳定增长期（2006—2010）。（1）根据 WTO 规则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市场准入和

业务范围上进一步履行加入 WTO 承诺。同时继续刺激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鼓励培育跨国公司。（2）科学应对贸易摩擦，为了保障出口企业的利益，我国实施保障出口的同时扩大进口的政策，在政策上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规范化学品、原油、成品油等物品的进出口管理。精简行政流程和手续，完善许可证、配额、国营贸易等管理手段，创造有序高效稳定的对外贸易环境。（3）对技术研发更加重视，更加强调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平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上一个台阶，鼓励企业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推动出口品牌发展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

3. 平衡发展期（2011—2015）。（1）更加重视改善外贸发展的环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外贸营商环境，加速推进国际合作。（2）利用高新技术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稳定外贸增长的同时，提升对外贸易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优质

服务,提高中国企业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同时加大鼓励出口企业的品牌建设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扶持力度来加快其发展速度。(3)在原有自贸区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国内自由贸易区,将上海自贸区的试点经验推广到广东、重庆、天津、福建等地,更大程度向世界开放,逐渐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由东部拓展到西部,由沿海拓展到内陆,加强全国各地区与国际之间的贸易交流,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4. 稳中提质期(2016—2019)。(1)更大力度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在吸引外资的基础上,该阶段的外贸政策在提高外资的利用率方面给予了更多重视。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开始着手,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2)出台针对不同行业的扶持政策,比如对于向中西部转移加工贸易的企业,政府给予财税补贴等差异化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国内外贸布局。给予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国家财政支持,鼓励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发展等,促进外贸市场活跃。(3)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措施更加丰富。支持企业对关键技术的研发,将重点放在外贸产品研发、品牌培育上,鼓励企业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出口迈向中高端,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五、2001—2019 年对外贸易政策演变规律

纵观 2001—2019 年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经过大力出口期、稳定增长期、平衡发展期和稳中提质期,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较为显著变化,呈现明显的演变规律。

1. 外贸政策聚焦点实现了三个转变。(1)从鼓励低成本、低价格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转变。入世初期大力发展出口的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等,我国外贸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过度依赖于低价格和低质量,外贸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对外贸易政策,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提升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通过政策

支持提升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从注重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实现我国外贸政策的长期目标。加入 WTO 后,我国外贸增长凭借低成本要素承接大量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发展壮大。而成为一个贸易强国需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所以新时期我国外贸政策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外贸发展方式更加与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外贸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优进优出转变。(3)从重视扩大出口向均衡发展进出口、实现贸易平衡转变。在加入 WTO 初期,对外贸易政策主要聚焦于通过改善出口条件和取消歧视性政策来扩大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规模,努力扩大出口市场容量。我国贸易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逐渐放缓,为了进一步突破增长瓶颈,我国外贸政策强调在稳定增长的同时优化贸易结构,进出口均衡发展,丰富国内消费需求,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缩小进出口顺差。

2. 对外贸易政策变迁的过程是对外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发展的过程。入世之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基调为 WTO 规则下公平与保护并存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重视引进外资的同时,也更多地开始鼓励中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实现双向平衡发展。在逐渐融入国际经济环境的过程中,国内经济发展也逐步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强调改革创新、大力扶持。重点举措有统筹协调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强化金融支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等。并且逐渐放宽各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降低关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

3. 对外贸易政策的保障措施在变迁过程中越来越完善。在调整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协同配合、鼓励多方参与,重视社会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不断更新管理手段和方式,灵活处理不同产业、不同情况的外贸政策。外贸政策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规范行政管理体制、完善财政金融政策、贸易摩擦预警和及时处理、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减少损失。充分发挥外贸新业态优势,切实支持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保障企业与国际进行技术交流。参与世



界贸易规则的修订甚至改革,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 六、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全球化合作的重要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带来危机,也对全球贸易造成挑战,国际贸易往来大大减少。未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环境多变,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可参考以下发展方向:

1. 丰富政策工具类型。增加与贸易有关的融资政策、产业政策的比例,运用补贴及政府支持等丰富的对外贸易政策工具提升外贸政策覆盖的全面性。尽量使用具体可操作的文种类型,使用办法、规定、规则类等操作性强的政策,对政策实施进行具体规范,这有助于帮助外贸从业者深入理解国家政策,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增强与其他部门机构的合作,加强与环保部门、发展改革委等相关机构部门之间的府际联系,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稳定外贸发展,提高政策执行力。

2. 聚焦高新技术产业扶持政策。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高科技产业较为薄弱,在核心技术上的投资占比比较小。对于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等基础型产业,应运用高新技术对其进行改造,从品牌、营销服务等方面提高边际产业的产品附加值,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从管制型工具的角度,对于研发高新技术产品所需的进口产品,应放宽限制,促进国内企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自由便利的外贸环境。从鼓励型政策工具的角度,加大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对于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等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产业,更应支持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发展,引导企业在研发上增加投入比例。从保护型政策工具的角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规范知识产权市场,给予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出台切实的补贴政策。通过政策上全方位的支持,加快我国外贸企业科技创新的进程,保证研发质量,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3. 强调有针对性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政策内容上根据行业和区域的不同出台差异化的外贸

政策,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积极拓展更多国际化平台,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在借助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等现有平台的基础上,还应持续推进自贸协定谈判,促进进出口贸易合作,尤其是服务贸易上的国际合作。除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应将更多的贸易交流拓展到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将国内满意度高、消费者评价好的产品因地制宜地根据出口国的国情本土化包装,挖掘更多有潜力的贸易伙伴。

4. 继续培育外贸新业态发展。在疫情影响下,国内外消费者选择在线采购的比例大幅增加,给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利用科技、信息技术的优势在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应该在营商环境、监管措施等方面支持和鼓励数字贸易出口,建设辐射范围广、影响能力强的数字贸易出口基地,积极拓展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加强线上发展市场的能力,继续培育外贸新业态发展。

未来我们应做好应对日益频繁的摩擦和挑战的准备,高质量地深入发展各项外贸战略,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国际市场布局,开创开放合作、包容普惠、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 BOWN C P, CROWLEY M A, et al. The empirical landscape of trade policy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1): 3-108.
- [2] 余森杰.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奇迹:成就与路径 [J]. 国际贸易, 2018 (12): 4-9.
- [3] 郭凯. 中美贸易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优化策略研究 [J]. 商场现代化, 2018 (12): 98-99.
- [4] 邢学杰.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稳健发展的路径研究 [J]. 中国发展, 2019, 19 (1): 36-45.
- [5] 韩慧霞, 金泽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外贸产业升级影响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检验 [J]. 商业研究, 2019 (10): 69-77.
- [6] 肖维鸽. 我国新一轮对外贸易政策对扩大进口的影响及应对 [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 (5): 79-82.



- [7] 赵伟. 中国对外贸易40年: 政策回顾与展望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2): 29-36; 135.
- [8] 李衡, 任引. 中国迈向贸易强国: 现实差距与实现路径 [J]. 对外经贸实务, 2018 (6): 93-96.
- [9] 李钢.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路径 [J]. 国际贸易, 2018 (4): 4-6.
- [10] 赵勇, 张明霞.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特征、成效及问题 [J]. 新视野, 2017 (3): 35-41.
- [11] BURYI P, LAHIRI 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rade policies for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competition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8 (80): 429-440.
- [12] 丁宇, 涂明亮.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中的政府行为 [J]. 商业经济研究, 2015 (26): 104-106.
- [13] 周定根, 杨晶晶, 赖明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 [J]. 世界经济, 2019, 42 (1): 51-75.
- [14] 黄萃, 任骏, 张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 12 (2): 129-137; 158-159.
- [15] 李江, 刘源浩, 黄萃, 等.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 12 (2): 138-144; 159.
- [16] 裴雷, 孙建军, 周兆韬. 政策文本计算: 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 [J]. 图书与情报, 2016 (6): 47-55.
- [17] 盛斌, 魏方.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 回顾与展望 [J]. 财贸经济, 2019, 40 (10): 34-49.
- [18] 陈振明, 张敏. 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 1998—2016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7 (6): 109-116.
- [19] 黄红华. 政策工具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J]. 社会科学, 2010 (4): 13-19; 187.

## Change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ies: Based on Text Metrics from 2001 to 2019

LIN Yuan-yuan, CHE Lu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sample in this paper is a total of 319 foreign trade policie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from 2001 to 2019. First of all,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quantity and policy tools, the foreign trade policy tools are divided into control, encouragement and protection. Then, a text econometric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elf-programmed software 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y change of subject words, 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i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s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from 2001 to 2019 are as follows: the focus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shifted to high technology content and high added value, to quality and benefit, and to trade balance; the process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changes was the process of foreign trade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trade policy safeguard measures were getting close to perfection.

**Key words:** foreign trade policy; policy changes; text measurement;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责任编辑 陈蒙腰)